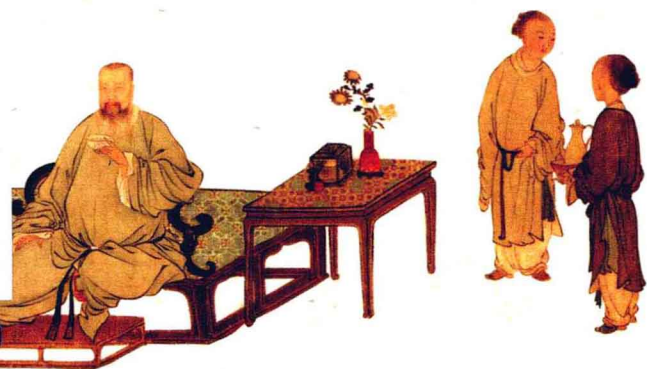


经典品读书系

史记

杨树增
王传飞
◎ 评注



蓝天出版社

史记

杨树增

王传飞

评注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杨树增,王传飞评注.—北京:蓝天出版社,
2012.10

(经典品读书系)

ISBN 978-7-5094-0809-4

I. ①史… II. ①司… ②杨… ③王…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②《史记》—注释③《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3866号

选题策划:刘春燕

责任编辑:刘春燕 杨树增(特邀)

史记

出版发行:蓝天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14号

邮 编:100843

网 址:www.ltcbs.com

电 话:010-66983784(编辑) 66983715(发行)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印刷

开 本:16开(787毫米×1092毫米)

字 数:371千字

印 张:25.25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前言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汉代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精通天文、易理、诸子之学。迁幼而好学，二十岁始，游历江淮、汶泗、梁楚等地。后任郎中，奉使西南，又侍从武帝巡视，踪迹几遍全国。元封元年（前110年），父临终前嘱托他完成修史宏愿。元封三年，继父任为太史令，得以饱览国家藏书。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为李陵兵败降匈奴事辩解而获罪下狱，受宫刑。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虽任中书令，唯念发愤著书，约在太始四年，基本完成《史记》的著述。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下狱，曾致书恳请司马迁援救，这年冬司马迁写了《报任安书》，此后司马迁的行事便不得而知。不过，《史记·匈奴列传》结尾处有：“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紧接着的“太史公曰”流露了司马迁多年来对汉武帝偏袒、重用贰师李广利的愤懑之情，“唯在择任将相哉”句重复叠叹，见出感慨之深。传文与传赞文意相连，不像后人所加。李广利降匈奴是征和三年（前90年）的事，除此之外，在《史记》中再不见有这一年以后的史实记载，如李广利在征和四年被卫律所谗杀，这本是一件重要的事件，却没有再补写进去。看来公元前90年后，司马迁的生死就不得而知了。司马迁一生，紧紧与《史记》相联系，当他悄然离开人间，留下的却是璨若明星的一部巨著，那里有他全部的智慧、卓识、希望、幽愤……字字都凝着他的血泪，司马迁及其《史记》中的人物形象永远活在后人的精神世界里。



司马迁要生动地反映从黄帝到汉代武帝时期三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很显然，过去那种单纯的记言体和以时系事的编年体，已无法适应新内容的要求。他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与目的，在对先秦史著吸收、改造的基础上，在中国历史社会变革特点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他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归类排比，找到了思想上高于众史家，内容上丰富于众史著，在形式上优于众史著的体例，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合一的形式。这五种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又以本纪、世家、列传人物传记为重点，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新体例。这种纪传新体例既可以展示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又可以表现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还可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巨大而丰富的创造性，具体表现为：

一、《史记》写作的基本原则

《史记》传记所描写的历史人物，都是以往真实存在过的，《史记》传记的基本要求就是如何将这些历史人物真实地形象地表现出来。历史的真实性要求作者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艺术的形象性又要求作者必须使人物达到艺术的典型化，历史真实与艺术典型化的统一是司马迁人物传记创作的基本原则。使传记人物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文学的典型性，是可以达到的，当然这种统一的工作做起来很难，应该承认《史记》传记在这方面也并非完美无缺的，有时为了文学性而糅入一些非信史的成分，这方面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提出了不少质疑；有时为信史性而削弱了人物典型化塑造，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人物传记还是成功地以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向后代展示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真实的人情世态。《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用较之他以前任何一位中国史学家、文学家都难具备的客观性与严肃性来对待所有的历史人物，对他们的生命过程作了深刻而无情的真实剖析与描写。如那些被社会奉

为偶像的帝王，在司马迁的笔下都被抹去了神圣的光泽，甚至当今皇帝，司马迁也敢作《今上本纪》记其不肖之所为。陈寿《三国志·魏志卷十三·王肃传》中记载：“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今上本纪》这篇敢于逆鳞、为写真实而置生死于度外的文字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封禅书》所载武帝迷信、荒唐举止以及其他传记对武帝的贪纵、歹毒的揭示中，仍可看到作者的大无畏求实记史的精神。《史记》传记中有时故意收录一些荒诞传说，似与实录不符，但往往字里行间充满讥刺嘲讽，意在描写传中人物因某种政治需要而和迷信、荒诞相联系的历史真实。如《高祖本纪》中写有刘邦斩白蛇、神母夜泣一事，司马迁写其事并非相信其真有，而是揭露刘邦为了抬高身价惑众而伪造神灵附身，这荒诞本身也是一种现实，即刘邦起事利用鬼神的历史现实。

《史记》的真实，还包括对历史资料的博采精取，汉前史对于司马迁来说，本是个没有经历过的陌生的历史，文献资料中不乏迷信、虚妄的记载，司马迁能在黑沉沉的历史迷雾中看到历史的真相，主要凭其求实精神，使他能正确地分析判断，采集历史生活中的真实，纠正史料中的不实之处。司马迁对待广博的资料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就是综合、贯通、熔铸；“整齐”就是选择、取舍、组织。“厥协”之中有继承、吸取，“整齐”之中有批判、改造。司马迁对所有的资料都要进行甄别，对于神异古怪、空、虚、非、过等荒诞不实的史料，都予以考辨，决不轻易使用。如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在《刺客列传》中说：“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史记》成书时期，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神学猖獗的时代，大一统的封建社会要求每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都统一在经学化了的儒学思想体系之中，否则便是离经叛道。但司马迁独能尊重历史事实而不畏于巨大的社会思潮，他服从于真理而不求合于经典，在他的人物传记中，不仅给被罢黜的“百家”人物立传，而且有褒扬之处，对独尊的儒家一派人物也不乏贬损之词，对中国历史人物有自己独特的



公允的评价。

《史记》传记虽然以历史真人真事为题材，但对历史人物并非凡事必书或有闻必录。《史记》的传记人物形象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它不能脱离历史的真实，但它也不同于像文书档案中人物履历一类的资料，它有活生生的、鲜明的人物性格特征，达到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典型化的统一。为此，司马迁对传记人物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艺术加工。

首先，是对历史真实进行选择、提炼、集中和概括。《史记》传记对人物素材的选择、提炼主要是从人物形象的特征出发，而不是主要从历史现象出发，这就要舍去那些从历史学角度看认为是重要的而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是非典型的东西，有时还故意隐掉或略述重大事件，反去细腻地刻画某些生活琐事，如李广身经七十余次战争，作者只写其战败的几次，七十余战对历史都有一定意义，作者却舍去大部分战役而去写李广误认顽石为虎，射“虎”没镞之事，为的是突出李广有臂力善射的特征。对历史真实的选择、提炼、集中和概括，使杂乱、分散、偶然的人物特征更集中，使被普遍意义的光辉所照耀的本质特征更豁亮，也就使传记人物比历史原型人物更形象，更能反映人物的真实本质特征。

其次，在历史真实的描绘中渗透了作者的感情。司马迁往往将主观感情寓于客观的描绘之中，人物形象中有作者的好恶之情和浓厚的身世之感。《史记》传记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折射着司马迁思想和感情的光泽，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客观历史真实与作者主观感情的统一，作者还在对历史人物的描绘中，加进了自己的评价，这不仅不会使人物形象失真，反而更加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

最后，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凡事必有所不知，凡言必有所不闻，就是记录发达的今日，各种资料也不可能提供各个方面的细节及言谈记载，更何况那些无人知晓的秘言秘事。《史记》不是单纯的历史材料的编次，在汇集资料的基础上，有作者依托历史而进行的创作，这种创作主要体现为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合理的想象与虚构是《史记》传记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典型化相统一的重要方

法与手段。《史记》传记的虚构从形式上看是“虚”，实质是以理度真，以情揆真。所虚饰的虽不全合历史原貌，但人们想象、揣度，认为历史就该如此，情理之真与“虚饰”达到认识上的统一。

二、《史记》的主旨与结构

《史记》传记通过历史人物表现中国历史社会的变革及作者对变革的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史记》的主题，就是《史记》结构的前提，因此对历史人物，一般注重揭示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对历史人物材料的选取，多是人物参与社会重大变革的举止言谈，即使选入一些小事小情，也从属于社会斗争，从另一侧面表现社会重大事变的预兆。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五·古文十弊》中说：“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史记》传记人物多数处于紧张、激烈的社会斗争气氛下，攻讦、政变、战争，处处钩心斗角、剑拔弩张、血雨腥风，各种复杂而惊心动魄的社会斗争关系的展示，成了《史记》传记最精彩的题材。具体到每一个传记人物，主旨是要表现这个人物在历史社会变革中的角色，这就需要从众多的材料中，选取那些最能表现其角色特征的素材，而剔除那些非特征的材料，使材料的内容与人物的特征趋于一致，这样，人物传记的主旨明确了，角色的形象也鲜明了。某一人物传记的主旨是《史记》传记整体主旨的一部分，《史记》传记整体主旨使其所有的人物传记具有了统一性与联系性，每篇人物传记的主旨统一在《史记》传记整体主旨下，都又对本传记的材料与格局有统摄作用。明确的主旨使《史记》传记人物虽多、内容虽丰富但不松散。

《史记》传记主旨是通过传记人物特征的展示而显示的，因此，展示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即人物特征的发展过程，就成了《史记》最恰当的结构形式。司马迁将人物传记分为四大类：单传、合传、类传、附传。传记类型的确定，绝不是简单的人物数量的缀合或分离，而是依据人物命运特征所构成的合理结构。单传是单个人的传记，如《项羽本纪》；合传是两人或数人的传记，如《鲁仲连邹阳列传》是鲁仲连与邹阳二人合传，



《樊鄴滕灌列传》是樊哙、鄴商、滕公夏侯婴、灌婴四人合传；类传是一类人的传记，或性格、或事迹、或职业等方面同类或相类似而并于一传，如《货殖列传》；附传是不限于传名所记人物而兼书他人，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赵奢、赵括、李牧等人的传即是附传。这四种形式都只能从大体上认定，实际上这四类传记互相结合、互相渗透，只是各有偏重不同罢了。

每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经历是很曲折的，他的思想、性格也是很复杂的，为了在人物传记中集中表现一定主旨和人物的主要特征，又不违背历史之真，司马迁就将与一定主旨、人物主要特征不统一、不和谐的方面，分散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或为了达到一定的隐讳目的，也用此法，将隐讳部分散于他人传中，这就是本传晦之他传发之的“互见法”。单篇传记见人物的主要特征，结合其他传记才见此人物的全貌，正述在本传，补充在他传。除了互见法外，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物传记对此有不同角度的叙述。对事件来说，各传所叙可以互为补充阐发，对于不同的传记来说，同一事件在各处说明的问题和表现的人物特征各不相同。如《史记》传记有四处写到鸿门宴，《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描写全面细致，刻画了项羽忠厚迟钝的性格，突出了宴会的斗争是楚汉重大政治斗争的转折；《高祖本纪》中的鸿门宴重在描写汉方转危为安，刘邦君臣计谋的成功，略去了《项羽本纪》中刘邦那些窘迫恐慌的描写；《留侯世家》中鸿门宴的描写重在突出张良多智多谋；《樊鄴滕灌列传》中鸿门宴的描写则重在突出樊哙的勇捷刚烈。

《史记》传记篇末都是“太史公曰”式的短文，个别篇前篇中也有此形式，作者议论、抒情都是从传记人物命运特征、传记主题出发，与传记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传记统一结构有机的一部分。这种论赞形式看似整齐划一，实际却变化万方，有的揭示传记主旨；有的点明人物命运特征的意义；有的对人物公开褒贬；有的增添余波加了弦外音等等，使整个传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刘勰《文心雕龙·熔裁》）。安排合理、组织严密、脉络清晰的《史记》传记结构，表现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命运特征的深切感受与深刻认识，也表现了这种感受与认识在艺术表达上

的高度组织技能。

三、《史记》中的人物形象

根据人物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及作用,《史记》把人物分别列入《本纪》、《世家》、《列传》三个不同层次之中。《本纪》十二篇,是帝王一类人物的传记,《世家》三十篇,是诸侯一类人物的传记,《列传》七十篇,是公卿将帅一类人物的传记,但司马迁安排人物本不从名分出发,而是从人物的实际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出发,这正是他自己的体例,如项羽无帝号而列《本纪》,孔子属布衣而进《世家》,扁鹊一医师而入《列传》。《史记》中的人物是一批站在时代激流前面勇于进取的人,这些人所具备的巨大历史创造力,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特征,代表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古老的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与演变特征。

《史记》中的人物有着广泛代表性。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所欲论载的是“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明确指出《史记》入选的人物包括社会上下各阶层。司马迁努力以众多的各方面的人物来表现大变革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来实现其全面反映历史生活的目的。在中国典籍中,《史记》第一次包容了如此众多、代表性如此广泛的人物形象,人物的代表性广泛到几乎覆盖全社会的每个阶层。

《史记》传记人物形象对历史社会生活的本质有深刻的揭示与概括,充分地体现出人物的社会关系、时代生活特征的普遍性和历史发展的趋向性,否则就不会那样强烈地引起全社会读者的共鸣。如《陈涉世家》中的陈涉,是我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第一次农民起义出现后,司马迁就抓住了这个人物身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第一次对我国古代农民战争作了生动记载,创造了陈涉这个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光辉形象,显示了中国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功勋。同时又客观地描述了陈涉农民起义种种固有弱点,陈涉这个人物形象所体现的中国农民起义者的普遍特性为后来历代农民起义所证实。

《史记》中每一个人物又是不可混同于别的人物的独特的形象,人



物无不各具神态，具有生动、鲜明的独特个性。尤其是那些帝王人物，作者剥去了他们神圣的外装，或写他们奋发向上、兴国强邦，或写他们昏庸无能、误国灭族，或写他们残酷、虚伪，或写他们荒淫狂诞，还帝王以活生生的凡人特性，也还帝王自己的独特个性。《史记》传记人物是活灵活现的典型形象，他们真实、可信、感人，不论时隔多久，只要一翻开《史记》，那些传记人物的音容笑貌就马上会在读者面前展现。

《史记》所记三千年中国社会动荡、巨变的历史，成千上万的人们前仆后继、慷慨赴难，给众多的历史人物普遍地涂上了悲壮的色彩。司马迁客观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时期人物的特征，在《史记》传记中，差不多有一半的篇目是为悲剧命运的人物而立的，一部《史记》大约共写了120个不同悲剧命运的人物，在他们身上都寄托着司马迁悲剧性的身世感。

《史记》的人物形象都是在历史真人基础上艺术加工而成的，司马迁不能虚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不能虚构人物主要的事件与生活环境，更不能去虚构人物的内心活动，只能比较客观地从人物经历中去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而见内心世界是《史记》刻画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极少有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史记》刻画人物形象还辅以“衬托法”，即以彼人物的形象来见此人物的形象。衬托法有反衬与正衬两种，用互相不同甚至相反性格特征的人物去衬托可谓反衬，用相近或相似性格特征的人物去衬托可谓正衬，衬托与对比、对称有相似处，但却不等同。对比、对称是双方比较，使得两者相得益彰，衬托却是一主一宾，以宾衬主，使主体更突出、鲜明。还有一种写法是借其他人的评价来充实重点人物形象。如汉文帝评李广：“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李将军列传》）寥寥数语，点出了李广善战无赏“不遇时”的现实。

四、《史记》的情节

司马迁注重择取重大的社会事件来构成《史记》的基本情节，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在这种条件下才显得深厚、清晰而有光彩，充分显示出

历史时代“弄潮儿”和其他各种历史角色的鲜明性格特征。当然,《史记》传记也不是没有日常平凡事件的描写,如刘邦相面、张良圯上受书、张汤审鼠,陈平娶张氏女等,但这些细事的记叙是为了使人物在重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更自然、更丰满、更突出。司马迁注意人物在重大事件中行为的因果性,因而传记中的情节一般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发展全过程。

《史记》传记的情节不追求违背客观规律的巧合,也不故作惊人之笔,不故作悬念来紧扣读者心弦,有时反而却是常用一些微妙的细节,将后面重大情节发展的趋势预示出来,情节安排极其自然、了无凿痕。《史记》传记情节的安排有两大鲜明的特征:“奇”和“曲”。《史记》的“奇”,就是指取材不凡庸,故事情节有新奇性。《史记》传记中的人物都是非凡人物,他们超群绝伦的曲折经历,尖锐复杂的社会关系,惊心动魄的各种斗争,全是构成情节“奇”的基础,司马迁爱好情节惊险、奇异,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传中的奇人奇事以及自己的奇特感情。《史记》传记情节之奇,不是荒诞之怪奇,也不是故弄玄虚之假奇,而是一种对情节的艺术典型化。《史记》的“曲”,就是指描写不简直,行文有变化。司马迁行文讲究疏密相间、虚实相参、笔法多变,传记情节发展讲究急徐有致,正反相成,相映成趣,疏略处能总其大概,细密处曲尽吞吐之妙。如项羽垓下被围,在激烈的矛盾冲突推进中,又插入项羽夜闻楚歌,自作诗慷慨悲歌,美人虞姬唱和,左右随从涕泣的平缓小插曲,淡处着笔,虚处传神,都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为了更好地达到情节“奇”与“曲”的艺术效果,司马迁常用人物的奇闻轶事和虚构细节来充实情节,传中人物形象便活脱脱显现出,几乎达到伸手可触的地步。

《史记》传记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感情,同时他们又都是作者的感情所强化的艺术形象,在他们的形象之中,交织着作者的人生经验,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饱含着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司马迁将自己的主观感情贯注于《史记》人物的塑造之中时,他采用了三种形式:一是将感情寓于人物的叙述描写之中,二是感情在语调上的自然流露,



三是直接对人物表达感情或借用传中其他人物来抒发感情。作者主观感情在传记人物身上得到反映，使得《史记》传记人物形象具备了强烈的抒情色彩，极大地触发读者内蕴的情感。《史记》人物形象浓厚的抒情性常使读者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也是《史记》传记人物性格刻画异常深刻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史记》的语言与风格

司马迁是汉代伟大的语言艺术家，他对古奥的传统书面语进行了改造，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口语进行了合理吸收，创造了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富有表现力的新的书面语。《史记》主要记叙传记人物的言行，让人物以实际行为和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叙述人的语言常起介绍、连贯人物和事件的作用。《史记》传记的叙述有直叙和婉叙两种形式，也称直笔和曲笔。直笔是直截了当的记叙，对记叙的人物、事件给以明确的揭示；曲笔是对记叙的人物、事件给以含蓄的暗示。司马迁书写历史，“实录”的笔法可谓“直”了，但他写汉史时就比书写其他朝代史所使用的笔法“曲”多了，贬损当世所使用的语言明显地语意隐约了，语气委婉了。如韩信以“谋反”罪被剪灭，在汉这是不可怀疑的铁案，司马迁从大量的史料与后人言传中，分析出韩信并无觊觎君位的野心，韩信的悲剧结果是刘邦、吕后一手造成的。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将这些胜于雄辩的史实一一写出，尤其是不厌其烦地记载武涉、蒯通劝韩信叛汉，韩信都给予拒绝，为了证实这一点，传记又记韩信被擒遭斩时，他后悔地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传末的“太史公曰”表面上谴责韩信，实际以曲笔在为韩信辩诬。曲笔是司马迁使用的一种迂回曲折地表现历史真实的艺术语言，它更多地体现了《史记》语言的艺术特征。

《史记》同一人物的语言在不同传记中有所变更的例子不少，如樊哙在鸿门宴上的一番话在本传与《项羽本纪》中就有些不同，这参差不同的语言是作者对传记人物语言进行艺术加工的佐证，进一步证明《史记》传记人物的语言许多是由作者设计出来的。有些人物的语言就是采

自于史料，也经过司马迁的增损与艺术加工。《史记》人物的语言不少 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经历、运用语言的习惯、具体环境条件和 心理情绪等因素而精心设计的。作者对人物语言的成功设计，完全是由 于对人物的透彻理解，让所塑造的人物按各自的性格去说自己应该说的 “话”。

司马迁很注意吸收众家语言之优长，从《史记》语言的纵横恣肆上， 明显看出对战国策士论辩语言特点的吸收。《史记》广泛援引古籍诗文、 民间流传的俚语俗谚，而且善于化用，别人的语言一经司马迁化用，便 焕然一新，推出新意，熔铸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语言。《史记》遣词 用句精练而能达意遗情，叙事明白，论理周全，少量的言辞包含着丰富 的内容。《史记》文辞精约，但不一味求简，比起《汉书》来，《汉书》 文字整饬、谨严，然缺少《史记》那种微情妙旨、朗朗上口的声调和纵 横不羁的语言气势。

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史记》传记艺术，所造成的高妙艺术境界， 是一个呈现在读者面前景真、事实、情笃、意切、出神入化的艺术天地， 从题材处理、体裁驾驭、形象塑造和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司 马迁特有的“雄深雅健”的艺术个性，即一种刚柔并济而又偏重于刚的 艺术风格。

《史记》艺术风格中的“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传记形式结构上看， 它宏大雄伟。有包罗古今、总揽宇宙之势。从写作的气质上看，它豪迈 雄浑，有褒贬百代、气吞山河的气魄与胆识。从传记的题材上看，它雄 阔奇特，凡是在中国大地上曾发生过的重大历史现象都无所不容，描写 社会人物之众多，反映社会事件之奇特，都是前所未有的。《史记》艺 术风格中的“深”，主要是指深切的感情、深刻的寓意、深妙的传神笔法、 深沉的文章气势。《史记》艺术风格中的“雅”，主要指言雅，也就是指 传记运用的语言简洁明快、真挚醇厚、平淡朴素。《史记》艺术风格中 的“健”，就是指笔法遒逸而富于表现力。司马迁行文只求刻画人物达 到形神兼备，不求合于陈规俗套。或国家大事，或生活琐细，皆可拈来 入传。或喜或悲或嘲或讽，皆可成文章。或议论或叙述，或描写或抒情，



笔法变化无穷而一样力厚味腴，行文奇诡恣肆，深得庄周文章风格之旨。形式上见“奇”，内容上传“神”，灵活变化而文理自然。空前统一、强盛的西汉王朝国势，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高瞻远瞩的思想认识，使司马迁以从未有过的历史主人翁姿态来俯视百代，以哲人的眼光来审视自生民以来的中国历史，于是其《史记》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雄”的特征。在真实地反映历史时，悲壮、激烈、残酷的斗争现实，严肃深刻的历史思考，作者不幸的遭遇，促使他对历史社会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从而使《史记》又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深”。“雄”多从宏观上着眼，偏重于规模结构等形式，“深”多从微观上作分析，偏重于形象、感情等内容。这种艺术特点又要求语言的纯精、通俗而富于表现力，即具有“雅”与“健”的特点。“雄深雅健”概括了《史记》艺术风貌的基调，形成了《史记》艺术独特的、强烈的、完美的主导风格。

六、《史记》的影响

能鲜明地反映中华古代文化民族特色与成就的，应首推伟大的巨著——《史记》，《史记》第一次具备了严格的历史学意图和相应的成就，标志着中国独立的、成系统的历史学从此诞生。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自从《史记》一问世，中国所谓的“正史”体裁便确立，作史者遵循其体例两千年，历朝把《史记》排在正史之首。《史记》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我国传记体文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史记》体例上的开创意义显而易见，然而《史记》更重大的开创意义还在于它所体现的史学与文学内容的创造性，那就是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以人物为中心，分门别类又相互配合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全部发展史。在文学上第一次比较自觉、比较完整地运用典型化艺术方法塑造了各种典型性人物，把中国散体的叙事写人艺术推向一个新高峰。

我国叙事文体的源头并不是古代神话与传说，而是始于历史资料，

始于先秦的“六经”。“六经而下，左丘明传《春秋》，而千万世文章实祖于此。继丘明者，司马子长。子长为《史记》而力量过之。”（叶盛《水东日记》）《史记》是中国散文体写人叙事的高峰，不仅对中国后世散文体的发展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其他形式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史记》之后，正史文学性日渐削弱，汉代的杂体传记却保持了《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并直接孕育出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而唐代传奇小说又是魏晋六朝志人、志怪的新发展。说到底，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学是孕育中国小说的母体，而这个母体是以《史记》为代表的。所以中国小说产生后，很自然地留有历史文学的特点，如题材常取之于史料或传闻。即使虚构，也想赋以史的形式，给人以真实的史的感觉。结构仿效传记，常以人物命运的发展过程来构成。写作上仿效传记按时间顺序来写，常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来连接各个部分，叙述人物事件有起因、有经过、有结果，人物性格变化与事件发展，追求其过程的完整。叙述语惯用第三人称，让故事中的人物以自己的言行来反映自己的性格，绝少有作者主观的心理推测及心理描写，等等。

《史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风上。《史记》人物传记，一方面寓情于叙事，一方面也以“太史公曰”的方式直接倾诉感情，出语痛快淋漓，快千古人心，创许多前人未有的技巧方法，又不拘泥于文法，转换化变匪夷所思，文笔清转简切，朴实易懂，不求古奥浮华，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其文风被后世散文家普遍推崇，几乎作为“文统”，每当形式主义的散文作品充斥文坛时，一些有识之士便标榜《史记》传记文学，来抵制空虚浮艳的文风。他们溯文学艺术形式之源，求文学艺术形式之本，源以古朴为式，本以写真尽情为主，《史记》的文风便成了他们文学改革的标尺，如唐宋二次古文运动。唐宋散文大家的自传、别传、类传等散体写人叙事的文章，传主从传统的名流高士扩大到了社会下层人物，出现了韩愈的《圜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苏轼的《方山子传》等，其精巧生动、通俗浅显，显然是《史记》艺术的发扬光大。



《史记》虽属散文体写人叙事文学，但对韵文体文学，如诗、赋、词、曲等也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史记》传记文学的题材及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为诗、赋、词、曲等提供了丰富的主题与题材。《史记》传记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一系列成功的艺术方法及经验，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系统化、条理化的文学理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今天我们对《史记》传记作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史记》传记千百年来乃至今日仍在精神领域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可以更大限度地挖掘蕴藏在其内部的精神财富。

本书所选的就是《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中的部分人物传记，还节选了《太史公自序》部分文字，可视为是作者司马迁的自传，有助于我们对其他传记的深入理解。配合原文，我们还作了题解、注释与评析，评析是我们最为精心着力的部分，我们总想把几十年来研究《史记》的心得体会奉献给大家，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

杨树增

2012年5月20日

于广州大学城广大榕轩